

二十一世紀評論

民族主義嬗變重探

帝國政治和主導性意識形態 ——民族運動的起源、發展和未來

趙鼎新

一 理論

民族主義運動以及民族國家建構研究是社會科學中的富礦，並且產生了許多有很大影響的理論^①。以筆者愚見，現存理論多多少少存在着以下幾個誤區：

第一，缺乏更長時距和宏觀的權力/結構視角。大多數學者強調民族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和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政治形態都是近現代的產物，並且認為其產生和發展背後有一些比較單純的結構性原因。比如，蒂利 (Charles Tilly) 提出以民族主義精神武裝起來的歐洲軍隊打仗更勇敢，戰爭因素促進了民族國家在歐洲的擴散^②；蓋爾納 (Ernest Gellner) 認為是工業社會裏人員的高度流動性和現代國家的教育體系性質等因素促進了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③；高斯基 (Philip S. Gorski) 強調新教 (基督教) 組織對其成員的各種「規訓」不但為歐洲國家提供了統治模版，並且為民族主義這一跨區域認同的發展鋪平了道路^④；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強調了現代通訊 (印刷) 技術在民族主義這一跨區域認同形成過程中的關鍵性意義^⑤。本文則強調，雖然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國家都是近現代的產物，但其思想淵源卻可以追溯到猶太/基督教的一些教義。本文還指出，雖然以上的理論都不無道理，不同階段和不同地區驅動着民族主義思潮和民族國家政治模式擴散的原因有着高度的多樣性，很難簡約到任何單一理論，但是帝國政治始終在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國家的形成和擴散過程中起着關鍵作用。

第二，研究民族主義運動的學者普遍有給民族主義運動的性質作出定性的欲望，提出了諸如宗教民族主義^⑥、族群民族主義^⑦、文化民族主義^⑧、

自由民族主義^⑨、公民民族主義^⑩等概念，並試圖區分出傾向於和多黨民主結合的公民民族主義，以及容易引發仇恨、暴力和族群清洗的族群民族主義^⑪。本文則指出，民族主義是一個內容非常單薄的意識形態，除了認定某類居住在某地、獲得了某種地域性政治認同的群體（民族）擁有自治權之外，再無其他。但這一特點卻給予民族主義思潮強大的生命力：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可以與性質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結構結合而形成高度多樣的變種。簡單地通過給不同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定性來把握其性質，非常容易讓我們忽視這一點。為了緩解這一困境，本文通過對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的梳理總結出四個在經驗層面影響巨大的理想型——公民民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宗教民族主義，討論了這些理想型的基本特徵，並且指出哪類理想型在世界上佔據主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帝國政治框架下世界主流意識形態的變遷。

第三，有學者強調民族主義運動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是捍衛文化多樣性的武器^⑫。本文則指出，民族主義運動在多數情況下都是精英操縱下的產物，並且民族主義運動往往也是地方文化多樣性的殺手。

第四，以往學者或者會認為民族想像必須要有族群、文化、語言等客觀基礎才能維持和壯大^⑬，或者會強調民族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⑭。本文指出，民族認同既可以植根於某種客觀的歷史、宗教或文化基礎，也可以建立在純粹的想像和製造的基礎上，並且民族主義運動的認同基礎有一個從客觀到主觀的發展過程。

下文對本文提出的理論與威默爾（Andreas Wimmer）和豪（John A. Hall）兩位研究民族主義運動專家的理論的相似性和區別作出講解，由此來點明本文的一些要點。威默爾的理論可稱之為「權力—合法性」解釋框架^⑮，而本文的理論則可以稱之為一個「帝國政治—意識形態」解釋框架，由於兩者有相似之處，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加以闡釋。威默爾的理論大致可以總結如下：近代歐洲國家力量不斷增強，插手社會的能力也不斷加大。在此過程中，歐洲的社會力量與國家力量不斷衝撞，最後實現了國家合法性基礎的轉變。具體而言，國家需要為國民提供公共物品並且給予國民政治參與的權力，而國民則為國家提供稅收和軍事支持。因為率先實現這一合法性基礎轉變的國家在軍事和政治上都要比帝國和其他政體形式的國家來得更為強大，這就導致了同構擴散（即其他國家開始仿效），民族國家這一政治模式因此逐漸取得主導^⑯。

威默爾認同如下一些被廣為認可的觀點，即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發展是一個帝國垮台的過程^⑰、民族國家這一政治模式具有某種內稟的同構擴散動力^⑱，以及民族主義運動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自由民族主義理論的影響。威默爾同時也強調不同國家間的軍事競爭對於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性，讓我們看到前述蒂利的現實主義理論的一面；雖然蒂利分析的只是民族國家在歐洲的形成和擴散，而威默爾卻把蒂利的邏輯推廣到整個世界。

筆者對威默爾的理論有四點質疑：第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很長一段時間，在英法這兩個民族主義思潮率先發展起來的國家，其統治者的疆域控制、自我認同和行為方式都更像是帝國，而不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民族國家。第二，至少到二戰前，傳統的帝國政治一直佔據着主導，決定世界政治格局的也同樣是大帝國之間的政治。與其說是民族國家戰爭能力強導致民族國家這一政治模式在世界上取得主導，不如說是帝國的擴張以及帝國之間的戰爭不斷給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提供機會。第三，大多數國家得以獨立並且發展成為民族國家，並不主要是因為那些國家內部執政合法性基礎的轉變，而是得益於帝國衝突而造成的非企及結果。第四，雖然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發展過程中都有廣泛的民眾加入，但是民眾往往是被動員起來的，而不是因為有了民族意識後才自覺加入。民族主義運動從根本上說是政治精英運動，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以國家或者其他政治精英為核心的國家建構運動，而不是一場在民眾與國家討價還價過程中產生和發展的運動。

在眾多的民族主義理論中，筆者的理論與豪的「帝國政治」解釋框架最為相似。豪強調民族主義運動的高度多樣性，決定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的主導性因素是政治，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並不是一個帝國垮台、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①。對於這些觀點，筆者都特別認同，但筆者對於民族主義的理解與豪仍有三方面的區別：第一，雖然民族主義是個現代現象，但它作為一個意識形態卻有前現代淵源，並且這個淵源並不是來自通常所認為的近代族群意識和國家能力的發展^②，而是來自猶太/基督教的零和性。換句話說，民族主義不但是現代產物，而且還是西方文化下的產物。比如，族群意識和國家能力在宋朝及以後的中國日益發展，但如果沒有西方給中國送來了民族主義，筆者很難想像在東亞的傳統文化和政治秩序中會自然發展出民族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第二，筆者更強調民族主義運動的多樣性和生命力的意識形態來源：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因為內容單薄而有着機會主義的特性，或者說它不但能和任何性質的社會政治結構結合，而且非常容易與影響力正在上升的任何性質的意識形態結合從而產生大量變種。啟蒙運動後產生的任何世俗意識形態都有過時的可能，唯獨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很難落伍。第三，筆者認可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的主導因素是政治，以及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並不是一個從帝國垮台到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但是相比於豪，筆者更強調世界範圍內的帝國政治在民族主義運動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在世界近代史中，帝國的性質和行為方式不斷變化，但其主導性始終沒變。

筆者對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和發展，以及對二戰後民族國家這一國家模式在全世界取得主導的解釋可以總結為一句話：近代以來的帝國政治和既定時空下主導性意識形態的結合，不但決定了民族主義運動的起源和發展，而且決定了不同時空下民族主義運動的性質。這個理論有兩個相互依存的要點：第一，民族是一種認同，除了家庭和其他一些在直接交往基礎上產生的認同，其他形式的認同的建立都得靠某種外在強制力，而不能僅僅靠共同語

言和文化等客觀基礎。第二，在所有的在外強制力中，國際政治，特別是大帝國之間的政治是最強有力並且最具制宰性的力量。

因此，研究民族主義運動的起源和發展都應該首先從帝國政治出發來做考察，而不應該僅僅從諸如族群認同、歷史記憶、對於民族自覺的追求、通訊和交流手段的提高、民族國家模式的擴散能力等強制力較弱的社會力量出發來建立各種「瞎子摸象」式的理論。這裏並不是說後面這些因素不重要，而是這些因素本身的重要性，或者說它們對於一個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的形塑作用，都首先受到帝國政治的影響。在本文中，「帝國」指的是地域龐大、內部文化和族群多樣、國際政治方面有一定主導權，並且對其他國家的主權有顯著的干涉意願和能力的一類政體模式，而不是狹義的專指近代西方侵略者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這也是目前國際學術界的一個通行用法。在國家建構史上，帝國這一國家形態已經延續長達數千年，發展出多種類型，至今歷久不衰。

二 民族主義發展的九個階段

基於本文提出的「帝國政治—意識形態」理論框架，筆者把近代民族主義的發生和發展過程分成九個階段，即九個歷史轉折點。以下是九個階段基本特徵的一個簡要總結。這個總結欲達成三個目的：其一是點明當代的民族主義思潮與猶太/基督教的關係；其二是闡述帝國政治和主導性意識形態如何推動民族主義運動在世界範圍的興起和發展，從而改變民族主義運動的性質，迎來了二戰後民族國家模式的主導，以及宗教民族主義運動的復興；其三是勾勒出一些重要、但在別的理论框架下容易被忽略的經驗事實。

(一) 猶太/基督教的零和性和民族認同的突破性發展

猶太教出現之前的世界是多神教的天下，彼時的征服活動通常伴隨着「勝者所推崇的神為大」這個規律。因此，隨着某些政治勢力的興盛，某些神的影響也逐漸強大，但這一發展並不改變多神教世界的基本宗教生態。從許多方面來說，猶太教的出現在人類歷史中具有轉折點意義。在猶太教取得主宰之前，由多個部落（傳統說法是十二個）組成的猶太人活動於迦南、埃及一帶，遵循着多神教的傳統，與近東地區的其他部落和部落聯盟並無本質不同。就猶太人的命運來說，成了「上帝的選民」既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它幫助猶太人確立了一個跨部落的認同，加強了內部的凝聚力，發展成一個在前現代就有了「民族」(nation)概念的群體。但問題也在於此：它將猶太人與其他群體之間的邊界清晰化。不難想像，在前現代的政治文化氛圍下，一個內在凝聚力強大、外在邊際清晰的群體勢必會招徠其他政治勢力的擠壓，而這種擠壓在縮小猶太人生存空間的同時，勢必會加強猶太人的民族認同。



在康斯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I) 歸信後，基督教有了較快的發展。(資料圖片)

必須說明，當代的民族主義思潮與猶太教並無直接關係，但是它們在思想上卻有高度的同構性。筆者很難想像，在一個多神教的世界中會出現認同清晰、邊際清楚的民族主義思潮。猶太教的興起可以說是為民族主義在近代的發展播下了一顆種子，而這顆種子將以基督教的形式得以保存。

對於本文來說，基督教的意義在於它在羅馬帝國框架下把零和性的猶太教改造成為一個兼具零和性和擴張性的宗教 (零和指的是一種「只有我掌握着真理，其他都是謬誤」的思維方式，擴張指的是基督徒在非猶太人中的傳教動力^②)。獲得了對外傳教動力的基督教從猶太教的一個教派發展成一個新興宗教，並且在康斯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I) 歸信基督教後有了較快的發展。如果說猶太教是一個具有民族性的宗教，那麼基督教則是一個具有帝國性的宗教，但基督教仍然在帝國/文明的規模下保留了猶太教的零和特性。

(二) 基督教的民族化與近代國際政治體系的誕生

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歐洲的歷史。衝突是人類社會的常態，但是基督教給了人類衝突一個特殊的表達：正因為基督教的零和性和擴張性，中世紀歐洲才會上演以傳播基督教為重要目的的對「蠻族」的征服活動^③，有針對非基督教國家的十字軍東征和再征服運動 (Reconquista) ^④，有對各種「異端」基督教派的血腥鎮壓^⑤，有充滿激情的對外傳教活動，等等。這些發展的後果之一就是 在充斥政治紛爭的歐洲維持了天主教世界 (Catholic ecumene)，直到宗教改革運動興起。

對宗教改革運動產生的分析並不是本文的重點。與本文有關的是，該運動所引發的延續一百多年的宗教衝突撕裂了基督教世界，導致大多數歐洲國

家捲入宗教戰爭，並最終通過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 確立了所謂的「教隨國立」原則。對於民族國家的興起來說，這一階段的發展因為兩個關聯的原因而具有里程碑意義：

第一，宗教改革運動中各新教教派都加大了對其成員的宗教參與和道德規範要求，同時也加強了教會的社會功能。高斯基把加爾文教派國家中出現的類似發展稱之為「規訓革命」(disciplinary revolution)，並認為這標誌着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²⁶。高斯基沒告訴我們的是，對信眾規訓的加強是當時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常態，並不限於加爾文教派。比如，面對新教咄咄逼人的發展，天主教也進行了包括反對腐敗、發展學校和修會、向海外傳教、鎮壓天主教國家內部「異端」等方面的反宗教改革運動 (Counter-Reformation)²⁶。這些發展對於天主教國家同樣也有巨大的文化整合作用。

第二，更重要的是，宗教衝突為國家能力趨強的英法等國通過確立國教、打擊異端來進一步加強國家權力提供了良機。西方學者把在英法兩國出現的民族主義稱為「公民民族主義」，並認為此類民族主義不會導致族群清洗和被迫移民等現象。其實，公民民族主義和族群民族主義形成的過程中都伴隨着大規模的殺戮和被迫移民，它們的區別僅在於屠殺發生的時間點不同。1557 年以後，遵奉天主教的法國統治者與信奉加爾文思想的兩格諾派 (Huguenots) 發生了長達多年的衝突和戰爭，造成了「族群」清洗式的聖巴多羅買大屠殺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 以及大規模的被迫移民²⁷。在亨利八世 (Henry VIII) 確立英國國教聖公宗 (Anglican Church) 後，英國也發生了長達一百多年的以宗教爭端為核心的衝突，包括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內戰，以及隨後因天主教國王和新教議會之間的鬥爭而引發的「光榮革命」。整個過程同樣也造成了大規模的殺戮和被迫移民²⁸。筆者認為，英法兩國強制推行「國教」或者「國教派」的行為實際上構成了歐洲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第一波大規模「族群」清洗。正是由於這些血腥事件，英法兩國核心地區的文化認同在民族主義思潮出現前就有較高的整合，為族群意識不強的公民民族主義的興起打下了基礎。比較而言，同時期的神聖羅馬帝國地區由於原本族群/宗教構成就比較複雜，再加上國家分裂、國家力量普遍較弱等原因，沒有出現與英法兩國同等規模和普遍程度的前現代「族群」清洗，因此直到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思潮在德國形成之時，仍然保持着較高的族群/宗教多樣性。在外族 (拿破崙) 侵略的壓力下，德國於是就出現了通過族群而不是公民認同來定義民族的族群民族主義，此後在德國和世界各地出現的族群清洗和被迫移民，可以說是 不幸補上了在英法等國早已完成的一課。

如前所述，如果我們把猶太教理解為一個民族性的宗教，那麼基督教就是帝國性的宗教，宗教衝突對民族主義的歷史意義則是把歐洲世界的基督教民族化。筆者還想強調的是，彼時由宗教衝突而引發的國家建構僅僅為民族主義運動在後世的興起提供了必要條件，並非充分條件。如果沒有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革命 (美法革命)，歐洲的國家建構進程很可能會像宋朝以後的中

國一樣，長期停留在蒂利稱之為「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的階段，即一種由官僚統治、政治精英有較高文化認同，但是普通民眾缺乏民族意識的國家形式^⑨。因此，要了解當代民族主義的興起，我們必須從美法革命開始談起。

(三) 七年戰爭和美法革命

如果說猶太/基督教的零和性給當代的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一種思維和組織方式層面的基礎，那麼此基礎直到十八世紀後期的美法革命期間才有了「民族主義」這一新的歷史意義，而這一意義卻是通過帝國爭霸而導致的「七年戰爭」(1756-1763)，而不是民眾的訴求，才得以充分表達。此後，民族主義的猶太/基督教淵源被隱藏到背後，而帝國政治則成了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國家興起和發展更為直接的動力。

七年戰爭以英國、普魯士聯盟為一方，法國、奧地利、俄國聯盟為另一方，是一場由英法主導的歐洲帝國在歐洲本部和殖民地的爭霸戰。對於民族主義運動來說，七年戰爭是美法革命的導火索。雖然英國在戰爭中佔據上風，獲得許多新殖民地，但卻陷入財政危機，而在北美殖民地徵稅就成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直接起因。法國同樣因為多年的戰爭，包括對美國獨立戰爭的軍事支持，陷入了嚴重財政危機，而法國革命就起始於路易十六(Louis XVI)為了增稅而召開的三級會議。

民族主義是美法革命的共同訴求，或者說美法革命標誌着民族主義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然而，此時民族主義的影響力僅僅局限在美國、法國和英國。即使在這些國家，民族意識也不能深入到稍微偏遠的地區。在此階段，自由主義是世界上唯一成型的世俗意識形態，而且是美法革命的意識形態基礎，因此民族主義自然就和正處於強勢的自由主義結合，形成公民民族主義。公民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的出現使得知識份子對民族主義的性質產生了一種誤解，即民族主義具有民主意義，是「公民」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政治共同體的一種方式，因而寄予厚望。

(四) 拿破崙戰爭、民族主義的擴散和族群民族主義的形成

美法革命後，民族主義思潮在歐洲其他地區開始湧動，但這僅僅局限在小部分精英群體。就算對於這些人來說，民族主義也是全新的概念，與傳統的出於對自己熟悉文化自發產生的情感並不容易分開。此外，對於這些精英來說，民族也不是他們主要的政治認同。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甚麼在拿破崙大軍屢破奧德軍隊後，作為日耳曼人的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會為拿破崙寫《英雄變奏曲》，為甚麼同樣是日耳曼人的黑格爾(Georg W. F. Hegel)會在拿破崙率法國軍隊在耶拿擊敗普魯士軍隊後把拿破崙譽為「馬背上的世界靈魂」^⑩。貝多芬和黑格爾的態度在啟蒙運動時代的知識群體中很有代

表性，因為他們都沒有只把法國革命看作是一場法蘭西民族主義運動，而是對法國革命的理念寄予厚望，渴望能生活在以這些理念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帝國中。當然，他們的希望馬上就會破滅。

拿破崙的軍事征服是典型的帝國行為，但這一行動卻把原本主要局限於英、美、法三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擴散到歐洲大部分地區。此外，在法國革命的影響下，同時期的拉丁美洲也爆發了反抗西班牙統治的民族主義革命，並且產生了玻利瓦爾 (Simón Bolívar) 這樣具有傳奇性的人物，雖然拉美的民族主義運動對於民族主義在舊大陸的擴散並沒有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

歐洲各國之所以都開始提倡民族主義，一種通常的解釋是被民族主義情緒調動起來的民眾打仗更有戰鬥力^⑧。這並非沒道理，但這裏要強調兩個更為直接也更重要的因素。第一，法國革命的核心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歐洲大陸啟蒙知識份子和啟蒙君主 (enlightened princes) 的共識，這才使得革命中迸發出來的民族主義思潮在歐洲各國被爭相效仿。第二，在法國、英國、美國、日本等國產生的「民族國家」嚴格來說都應該被稱為「帝國民族國家」(imperial nation states)，即對內進行民族國家建構，對外進行帝國擴張的國家。這些國度中統治者的思維和行動邏輯都高度混亂，以至於在侵略他國的同時卻會打着幫助他國民族解放的口號，而這些口號的背後除了各種現實考慮外，甚至還有一絲真誠，因為這類統治者的思維和行動邏輯本身就是集帝國和民族國家於一身。就這樣，帝國擴張和帝國衝突反而促進了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讓人因果倒置地以為民族主義運動本身是帝國的墳墓。實際情況卻是，法國革命後民族主義運動的每一步發展背後的最主要推手都是帝國擴張和衝突，並且強大的「民族國家」多少都會萌生帝國傾向。

中東歐地區的族群和宗教信仰構成要比英法兩國複雜得多。為了在文化高度多樣的土地上建構具有同質性的民族，該地區知識份子就在德意志浪漫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出以共同語言、文化、宗教等依據為基礎的族群民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堅持保護和弘揚自身文化，甚至往往會在民族主義運動中打着捍衛地方文化的旗幟^⑨。但真實的歷史過程卻往往是：為了在一個擁有高度多樣和地方化的文化和認同的地區建立統一的民族想像，各國精英都對內部不同文化施行了「清洗」。而且，一個國家建構統一想像的基礎愈差，其文化清洗的力度往往愈大。在一般情況下，民族主義有助於現代國家確立統一的語言、歷史想像和教育體系，但這對文化多樣性有很大的破壞作用。

族群民族主義所表現出的排外和族群清洗傾向，使得知識份子對民族主義的性質產生了第二個誤解，即認為公民民族主義帶來的是自由和寬容，而族群民族主義帶來的往往是族群清洗和被迫移民。這觀點至少有兩個誤區：首先，筆者在前文中已經指出，確立公民民族主義的英法兩國在天主教和新教衝突過程中就已經完成了族群和文化清洗。其次，公民民族主義的確為一個國家內部各種文化人群的共存提供了基礎，但是，相比於族群民族主義是

一個地域性很強的意識形態，公民民族主義則是一個地域性不強，以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共和等價值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公民民族主義弱地域、強價值觀的特性暗含着一種擴張性的帝國性質。在經驗層面，這一帝國性通過三個方面得以呈現：

其一，推崇公民民族主義的國家侵略成本較低，因為這套地域性隱藏在意識形態後面的語言比較容易獲得被侵略國家中價值觀相近人士的同情甚至支持。前面提到的貝多芬和黑格爾對拿破崙帝國擴張的慶祝和讚賞僅僅是兩個例子，在此後自由主義名義下的帝國擴張中，類似例子比比皆是。其二，一旦公民民族主義背後的一套自由民主話語成為主流價值觀，甚至被認為是歷史使然時，掌握着這套話語體系的自由主義國家的精英就容易把其他類型的國家都看低一等，從而在各種堂皇的理由下侵略他國或者干涉他國內政。這就是為甚麼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自由主義者往往會極力支持英帝國在中國乃至全球的軍事擴張^③，為甚麼蘇聯垮台後的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也特別熱衷於輸出民主、干涉他國內政等帝國行徑。其三，公民民族主義弱地域、強價值觀的特性容易讓一些有獨立野心，但又缺乏血緣、語言、宗教、歷史等地域/族群基礎的政治精英，聲稱自己所掌控着的群體是一個在同一價值觀下的「想像的共同體」。一般來說，一個群體在建構「民族」時的地域/族群基礎愈弱，有獨立野心的精英就愈可能會在尋求獨立時在群體內強行製造認同而對外則尋求價值觀相近的大帝國的支持，從而淪為該帝國的棋子，或者說間接成就了大帝國的帝國行徑。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需要強調，任何政體類型的國家一旦強大起來，多多少少會呈現帝國景象，這一點並不是以公民民族主義立國的國家所特有，但是公民民族主義弱地域、強價值觀的特性確實給帝國擴張提供更多便利。

(五) 帝國的全球性擴張/衝突和民族主義在歐亞大陸的蔓延

如果說民族主義在拿破崙時代仍然主要是歐洲現象，此後它則開始向北非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擴散。擴散的主要動因仍然是帝國政治，特別是近代歐洲帝國在全球更大範圍內的殖民和爭霸，以及在這些帝國的擠壓下傳統帝國的衰弱和垮台。例如，奧斯曼帝國的不斷衰弱，特別是第七次俄土戰爭(1806-1812)的失敗，引發了塞爾維亞和希臘獨立戰爭^④。英俄兩國圍繞着對阿富汗和中亞地區爭奪而進行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削弱了包括奧斯曼、波斯、阿富汗酋長國等傳統帝國的勢力^⑤，乃至清政府對西藏和新疆兩地的控制減弱，為民族主義在整個地區的興起鋪平了道路。此階段後期，日本也加入了帝國擴張的行列，並且在甲午海戰中摧毀了北洋水師，其結果是激發了民族主義在中國的興起。

對此階段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筆者想做四點說明：第一，民族主義這一在西方世界出現的現象在歐亞大陸的擴散過程中變得日益複雜，很難用公

民民族主義和族群民族主義這兩個理想型來概括。宗教民族主義在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地區正成為一支重要力量，但在西方強大的軍事和文化壓力下，彼時的宗教民族主義往往會與一些旨在學習甚至是趕超西方的支持改革的宗教教義結合，其宗教性的一面容易被忽略。第二，西方帝國的侵略和帝國之間的衝突刺激了非西方國家民族主義的產生，但是西方同時也是民族主義人才的培養地和書寫非西方國家「民族史」的思想武器庫。比如甘地 (Mahatma Gandhi) 就是在英國學習階段才深切感受自己作為英帝國二等公民的境遇，從而開始他為印度獨立而奮鬥的生涯；中國的第一代民族主義者 (如梁啟超和章炳麟) 的思想也是在日本居留期間才走向成熟。因此，雖然各國第一代民族主義者的思想都帶着自己文化的特色，但他們同時也深受當時西方盛行的各種思潮的影響。「進步—落後」分明的線性史觀、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種族主義等西方思潮，不但在日本的福澤諭吉、印度的甘地、中國的梁啟超和章炳麟等人的民族主義思想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深刻影響着這些國家歷史的書寫方式。第三，族群清洗和強制性移民現象在這一階段的民族主義運動中逐漸發展為常態，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今天。第四，雖然民族主義思潮在這一階段已經滲入到歐亞大陸和北非的大多數地方，但民族主義運動在西方殖民地中其實沒有產生很大影響^⑥。即使是在發生了辛亥革命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直到抗戰前也未能滲入到農村^⑦。

(六) 一戰、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

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被一名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槍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但其背後更大的動因則是歐洲各帝國在殖民地等問題上的長期衝突。一戰導致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垮台、英法帝國的衰敗和民族主義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因而構成了「民族主義的興起就是帝國的垮台」這麼一個印象^⑧，但一戰後主宰着世界政治的仍然是帝國。雖然美國總統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在巴黎和會中提出了有利於弱小民族自決的「十四條」，但會議最終發展成一個英國、法國、日本等主要戰勝國的「分贓會」^⑨。此後國際局勢的發展也再次見證了帝國政治的主導性：二戰前德國佔了奧地利和捷克，並和蘇聯瓜分波蘭；日本佔領中國的東三省；美國開始在古巴、海地、尼加拉瓜等拉美國家駐軍^⑩；連軍事能力有限的意大利也在希臘、巴爾幹和其他地區進行擴張^⑪。此外，國家統治者或其他精英對民族主義運動的控制也在不斷加強，但就影響力來說，即使是在民族主義運動已經有一定發展的中國，其影響仍主要局限在知識群體、工商業者和部分城市市民。此時非西方國家中的民族主義運動不但不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而且也不具有廣泛的民眾基礎。最後想指出的是，1929年 global 經濟危機爆發後世界各國都走向保守，法西斯主義盛行一時，當然也受到許多國家民族主義者的青睞。

就更長遠的歷史後果來看，共產主義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生卻是這階段的亮點。1917年十月革命前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工人沒選舉權，缺乏福利保障體制，當時的國家對經濟也都缺乏調控能力。因此，工人不但在基本權益方面得不到保障，並且直接承受着資本主義市場下經濟波動的壓力。在此大背景下，共產主義運動在歐洲各國取得很大影響，並在俄國獲得成功。

共產主義者認為，工人會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愈來愈強的超越民族的利益和認同感，民族主義因此會在歷史中逐漸消亡。這一設想有明顯的烏托邦性質。從社會學角度來講，以下三個原因決定了民族認同相比於階級認同具有更堅實的基礎：第一，民族認同能建構在語言、宗教、地域、血緣、族群等比較扎實的基礎之上，而階級認同的唯一基礎就是經濟地位，但工人之間的收入差異卻很大。第二，階級認同是反抗者的武器，它吸引的主要是社會下層和青年理想主義者；相反，民族認同不但能吸引社會各階層，甚至掌握着大量資源的國家統治者又或有獨立意願的精英群體也很有興趣和野心來構造民族認同。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是一個上下都有「幫手」的意識形態，而馬克思主義則不然。第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單薄的內涵決定了它是一個廣譜意識形態，即它很容易與影響力正在上升的其他意識形態結合並產生各種變種；相反，共產主義則是一個對「真理」有獨特理解的窄譜意識形態，因此很難逃脫以下兩個限制條件：要麼很難和其他意識形態做很好的結合，要麼結合得很好而失去自己的主導性。當然，對於民族主義的這些性質，當時的共產主義者並不十分了解。

十月革命前，民族主義思潮已經在俄國少數族裔地區蔓延。對於信仰共產主義的沙俄少數族裔的民族主義者來說，在俄帝國的版圖下建立超越民族的蘇維埃是一個更為進步的選擇。因此，布爾什維克領袖中少數族裔青年佔有很大比例，並且沙俄的疆域也以「蘇維埃共和國聯盟」(Universal Union of Soviet Republics)的形式得以保存^④。此時，雖然民族主義已發展出多種形態，但其主流並沒超出公民/族群民族主義兩個理想型的範圍。十月革命後民族主義出現了第三個理想型，即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具體來說，蘇維埃革命的成功使得通過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來實現民族獨立和富強成了許多國家民族主義者的一個選項。這就是毛澤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名言的歷史背景^⑤。

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注定是一種充滿張力的結合，而兩者之間的張力肯定會體現在蘇聯的民族政策和國際政治方針中。共產主義者認為，經濟和政治平等有助於壓抑民族意識。因此，蘇聯注重各民族的經濟和政治平等，而相對忽視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對於民族意識的重要性。為了幫助少數民族實現平等，蘇聯花了很多努力，成了名副其實的「平權帝國」(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到頭來不但造成了俄羅斯人的不滿，還給少數族裔的獨立提供了多種資源^⑥。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在性質上與公民民族主義有不少相似之處，最重要的是，它們都不強調族群和地域，而是伴有「帝國」的一面。蘇聯「輸出革

命」，在華沙條約組織國家內部主張「有限主權論」，要求各國共產黨不惜損傷本國利益對蘇聯提供各種支持，這些都是共產主義民族主義的帝國性的具體體現。蘇聯垮台的背後有許多原因，其中共產主義民族主義的內在張力所帶來的各種問題的確起了很大作用^⑤。但話說回來，在一戰到二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對許多國家的民族主義者來說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選項。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共產黨組織在十月革命後相繼湧現。

(七) 二戰、美蘇爭霸和民族國家時代的到來

二戰結束後，近代興起的西方帝國相繼垮台，殖民地獨立成了世界潮流，世界迎來了民族國家時代的到來，但整個過程卻仍然是在帝國政治的主導下才得以完成。簡言之，帝國之間的衝突導致了二戰，二戰期間各帝國的行為既促進了殖民地的民族意識，也為它們的獨立提供了資源。此外，由於美蘇這兩個在二戰後湧現的超級大國都支持民族自決，大量國家才能比較順利地獲得獨立。同樣重要的是，民族國家時代的到來並不意味着帝國政治成了歷史，只是帝國的性質有了重大變化。具體地說，以長期軍事佔領和建立殖民政府為手段的「正式帝國」(formal empire) 在二戰後變得過時，取而代之的是美蘇這兩個主要通過扶植利益或價值觀相近的代理人，以經濟和意識形態手段，輔以軍事威懾和手術式的軍事打擊來進行對他國控制的「間接帝國」(informal empire) ^⑥。

二戰期間及此後民族主義運動的幾個新的發展趨勢需要強調。第一，日本帝國在亞洲民族主義運動發展中有着三方面的重要作用：它的「成功」(即在明治維新後國力迅速發展) 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少非西方國家提供了一個模版；它的侵略刺激了被侵略國家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最後，日本在侵略時打着從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亞洲諸國，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等口號，其結果就是在東南亞一帶傳播了民族主義，與拿破崙在歐洲的擴張起到同樣的效果。

第二，二戰後湧現了大量新型國家。這些國家所在地區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在前現代時期處於採集社會和小型部落社會，它們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個國家，完全是因為殖民地的政治遺產。要在這樣的地方建立民族國家，主觀打造就變得愈來愈重要，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這樣的理論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才得以出現。這當然是個誤解，因為決定一個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想像方式和最終命運始終都是帝國政治主導，而不是印刷資本主義。

第三，這一階段新獨立國家內部出現了大量分裂運動、族群衝突和清洗。背後的原因很多，有些是美蘇爭霸所致，有些是殖民地行政區劃和管理方式留下的負面遺產，有些是殖民帝國撤離時有意無意種下的禍根，有些則是前殖民地母國製造事端、保持影響力的手段。民族主義曾經是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對抗西方列強的武器，現在卻和大國操控產生了十分密切的關係。

第四，二戰後共產主義國家從蘇聯一個國家發展成為「東方集團」(Eastern Bloc)。中國共產黨取得江山後，共產主義國家所控制的人口達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勢頭，再加上新獨立國家原來的殖民者都是西方列強，使得該時期的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會與勢頭正旺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結合，並且採取反西方的姿態。周恩來把這一潮流總結為「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⑦。左派知識份子由此產生了一個誤解，即認為反殖民和社會主義是民族主義運動的一個本源性質。

(八) 美國獨霸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回歸

自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在蘇聯共產黨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在西方曝光後，蘇聯的軟實力在西方乃至整個世界逐漸減弱。在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任職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十八年(1964-1982)裏，美蘇兩國在經濟、軍事和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不斷加大。加上中蘇關係破裂後共產主義陣營不復存在、美國所害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也並沒有出現等因素，美國的戰略目標和外交政策在1970年代中期有一個重大轉變。此前，美國的目標是遏制共產黨勢力的擴張，其策略包括在國內推動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在國際上支持右派專制政權、刺殺民選左派政府首腦、武裝訓練敵對國反對力量，乃至直接軍事干涉；此後，美國則開始推廣民主、發展人權外交。美國戰略目標的改變和蘇聯的衰弱乃至解體，給二十世紀末的世界帶來了鉅變。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把這一鉅變稱之為「第三波民主浪潮」^⑧。

第三波民主浪潮開始時，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信心暴漲的美國人不斷重蹈前蘇聯的覆轍。蘇聯強勢之時到處「輸出革命」，而美國則熱衷於人權外交、軍事干涉和「輸出民主」。美國的行為使得整個世界出現了一個虛假的同構擴散現象，即性質完全不同的反對派和謀求獨立的民族主義者為了獲得美國在金錢、物質、武器和道義上的支持，都打起「民主自由」的旗號。自由民族主義曾經是美法革命的旗幟，但在拿破崙時代過去後，始終沒有在世界上佔據上風。而「自由」民族主義的回歸給予知識份子普遍的幻覺，認為世界範圍的民主化時代即將到來。對這一觀點最著名的表達就是政治學者福山的「歷史終結論」^⑨，但他們馬上會失望。這裏給「民主自由」和自由民族主義中的「自由」都打上引號，是因為這些口號下混雜着不少原本與「民主自由」完全無關的政治勢力。

(九) 民族主義運動的多樣化和宗教民族主義的復興

在1980、90年代，「自由」民族主義在世界上佔據着絕對優勢，但它迅速退潮的原因卻是顯見的。成功的自由民主需要有一個寬容的文化，但是大多

數新興民主國家並沒有這種文化；成功的自由民主需要不同政黨之間有着比較接近的意識形態，但是大多數新興民主國家中政黨的意識形態高度對立；成功的自由民主還需要健全的公民社會，但是大多數新興民主國家的社會往往由部落、黑社會、大公司、地方強人和保守宗教組織把持。因此，除了少數國家外，民主轉型在大多數國家所帶來的不僅是經濟衰退、社會保障體系崩潰和低質民主，而且還有分裂主義運動、領土糾紛和由此引起的大規模仇殺和族群清洗^⑤。

本文已屢次指出，民族主義因為缺乏深刻內涵而從來沒有產生過自己的思想家，所以和時下的強勢意識形態接合才能產生力量。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強勢的時候都曾經受到民族主義青睞。可以說，一個時代民族主義的性質所反映的其實就是該時代的風貌。當今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呈四個特徵，折射了世界的大格局：

第一，自產生之日起，民族主義運動的性質在總體上趨於多樣，但在既定時空中，某一類民族主義思潮往往會佔據上風，反映了當時世界主流意識形態和帝國政治的格局。但今天世界各種性質的民族主義運動莫衷一是，體現了美國影響力的下降和世界開始失去主流意識形態。

第二，雖然當今世界的民族主義運動性質高度多樣，但宗教民族主義運動在印度、土耳其、伊朗、中東以及其他許多地區愈來愈佔據上風，並且這一波運動與十九世紀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宗教民族主義並不是民族主義運動的主流，但是宗教民族主義運動在今天世界的許多地區卻佔據着絕對主導。其次，十九世紀比較有影響的宗教民族主義一般都會選擇擁抱現代化改革的宗教教義，體現了啟蒙思想和理性精神在世界上的優勢地位，而當今世界的宗教民族主義往往會選擇保守、反現代化，甚至是反理性的原教旨宗教教義，說明人類正在經歷啟蒙運動後最嚴重的思想危機。

第三，「自由」民族主義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期間呈現了明顯的理想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傾向，但目前世界不少地區的「自由」民族主義卻開始呈現出各種保守傾向。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為例，雖然該運動打起的是「自由民主」旗號，卻出現了持續性的大規模騷亂和暴力，特別是對有中國大陸背景人士的「族群」歧視，顯露出嚴重的偏執、保守和不容忍精神。這種發展趨勢說明了任何意識形態在走下坡之時都會呈現保守的一面，自由主義也不能倖免。

第四，在中美、俄美戰略碰撞的前沿，美國主導下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餘威仍在，具體表現為各種自由民族主義和「自由」民族主義在這些地區仍是主流勢力。烏克蘭民選政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其領導下的烏克蘭腐敗盛行、經濟發展緩慢、政府效能低下，民族主義情緒卻十分高漲。這類民族主義在中俄周邊地區的大量存在，表明了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中俄目前也拿不出像1950、60年代的共產主義一樣能與美國對抗的價值體系。

三 總結

本文劃分了民族主義運動在近代形成和發展的九個最為關鍵的歷史階段，分析了各階段民族主義運動的基本特徵及形成原因，並且對為甚麼二戰後民族國家這一政治形態會在全球範圍內成為主流這一問題作出了解答。本文提出「帝國政治—意識形態」解釋框架，還對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性質作出了分析，並且提出以下幾個主要觀點，其中部分在學術界已有一定共識，有些則是筆者的觀點：

第一，雖然民族主義運動是當代的產物，其淵源卻可以追溯到猶太/基督教的一些重要元素，以及在基督教籠罩下前現代歐洲的政治發展。可以說，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但是西方世界的產物，而且猶太/基督教的線形史觀以及零和、擴張特徵，仍然形塑着當代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國家的一些根本性特徵。

第二，民族主義不但不是保護地方多樣性文化的法寶，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還是地方文化的殺手。因此，強調保護地方文化的民族主義分裂運動並沒有當然的正當性。

第三，民族主義運動不是帝國的墳墓。反之，帝國政治卻是民族主義運動發展最重要的推手。

第四，民族主義運動在多數情況下並不是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而是國家統治者或精英群體所推動的自上而下的運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決定一個民族主義運動命運的也主要是帝國政治，而不是某地區的精英文欲或者「人民」意願。

第五，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內涵單薄。這一性質卻給予民族主義一個其他意識形態所沒有的優勢，那就是它能與任何性質的主流意識形態結合，並產生比起所結合的意識形態更具生命力的變種。任何意識形態都會過時，唯獨民族主義一旦產生就很難落伍。

第六，在當今社會，一旦一個群體有了獨立欲望，即使沒有共同的語言、宗教和歷史作為想像基礎，他們也能聲稱自己是「想像的共同體」，用當前世界的主導性意識形態給自己的訴求進行道德包裝，強行製造認同感。民族主義在當前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可以無中生有進行建構的意識形態。

第七，雖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類型高度多樣，但它一般不會超出四個理想型的範圍：公民民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宗教民族主義。公民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民族主義都是族群/地域性較弱的意識形態，但是它們都很容易產生帝國傾向。族群民族主義有很強的地域性，雖然帝國傾向較弱，但卻很容易觸發族群清洗。宗教民族主義的性質比較複雜，要看民族主義者所堅持的宗教教義的性質而定，這裏的關鍵是零和性和擴張性這兩個衡量準則。一個宗教的教義愈具零和性，與其結合的民族主義就會發展出族群/文化清洗傾向；一個宗教的教義愈具擴張性，與其結合的民族

主義就愈可能發展出帝國傾向；而對於一個同時具有明顯的零和性及擴張性的宗教來說，與其結合的民族主義就會兼具兩種傾向。當然，以上總結的是理想類型下的因果關係，事實要複雜得多。

註釋

① 本文是對筆者正在進行的有關民族主義運動的起源和發展、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性質，以及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國家形態在全球佔據主導背後成因研究的一個綱要性總結，目的旨在拋出筆者在研究中初步形成的一些觀點，而不是給出系統性的論證。

②③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1990).

③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19-38.

④⑤ Philip S. Gorski, "The Protestant Ethic Revisited: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Holland and Prus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no. 2 (1993): 265-316.

⑤⑬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2006), 37-46; 7.

⑥ Philip W. Barker, *Religious Nationalism in Modern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Rogers Brubaker,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Four Approach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8, no. 1 (2012): 2-20.

⑦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Revival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Aviel Roshwald, *Ethnic Nationalism and the Fall of Empires: Central Europe,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14-1923*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⑧ G. Gordon Betts, *The Twilight of Britain: Cultural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ole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⑨ Yael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⑩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Macmillan, 1944).

⑪ Rogers Brubak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⑫ Bernard S. Cohn, "Representing Authority in Victorian India",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65-78.

⑬ Anthony D.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3); Miroslav Hroch,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⑮⑯ Andreas Wimmer, *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5-6; 4-5.

⑰ Andreas Wimmer and Brian Min,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Explaining Wars in the Modern World, 1816-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

no. 6 (2006): 867-97; Andreas Wimmer and Yuval Feinstein,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 to 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 no. 5 (2010): 764-90; Andreas Wimmer, *Waves of War; Nation-building: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⑰ Oszkar Jászi, *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Stanford J. Shaw and Ezel K.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2, Reform, Revolution, and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Aviel Roshwald, *Ethnic Nationalism and the Fall of Empires*.

⑱ John W. Meyer et al.,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no. 1 (1997): 152-53.

⑲ John A. Hall, "Nationalisms: Classified and Explained", *Daedalus* 122, no. 3 (1993): 1-28; Emre Amasyali and John A. Hall, "Weak Ruritians, Fearful Megalomanias: Nationalism and Empire 1878-1923" (unpublished paper, 2021).

⑳ Yanfei Sun,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Post-Mao China: State and Relig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2, no. 6 (2017): 1678-80; "Reversal of Fortune: Growth Trajectories of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in Moder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48, no. 2 (2019): 267-98.

㉑ Richard Fletcher, *The Barbarian Conversion: 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 (New York: H. Holt and Co., 1998); Alessandro Barbero, *Charlemagne: Father of a Continen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㉒ Eric Christiansen, *The Northern Crusades* (London: Penguin, 1997); Jonathan Riley-Smith,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L. P.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1500 to 1614*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Damian J. Smith, *Crusade, Heresy, and Inquisition in the Lands of the Crown of Aragon (c. 1167-1276)* (Leiden: Brill, 2010).

㉓ Richard Keickhefer, *Repression of Heresy in Medieval German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9); Mark G. Pegg, *The Corruption of Angels: The Great Inquisition of 1245-124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㉔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Oxford: Blackwell, 1999).

㉕ Geoffrey Treasure, *The Hugueno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7-78.

㉖ Manning Brian, ed.,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English Civil Wa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223-62; Nicholas Tyacke, ed., *England's Long Reformation: 1500-1800* (London: UCL Press, 1998).

㉗ Georg W. F. Hegel, "Hegel to Niethammer, no. 74" (13 October 1806), in *Hegel: The Letters*, trans. Clark Butler and Christiane Seiler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4.

㉘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ndreas Wimmer, *Waves of War*, 23-28.

㉙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㉚ Jennifer Pitts, *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19.

- ⑳ Virginia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㉑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0).
- ㉒ Emre Amasyali and John A. Hall, "Weak Ruritians, Fearful Megalomanias".
- ㉓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㉔ Oszkar Jászi, *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Stanford J. Shaw and Ezel K.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2; Aviel Roshwald, *Ethnic Nationalism and the Fall of Empires*.
- ㉕ Michael S. Neiberg,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 Concise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71-74, 93-95.
- ㉖ Lester D. Langley, *The Banana Wars: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the Caribbean, 1898-1934*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 ㉗ H. James Burgwyn, *It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war Period 1918-1940* (Westport, CT: Praeger, 1997).
- ㉘ Liliana Riga, *The Bolsheviks and the Russian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68.
- ㉙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70-71。
- ㉚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20.
- ㉛ Ronald G.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83.
- ㉜ Michael Mann, *Incoherent Empire* (London: Verso, 2003); Jeremy Black, *The British Empire: A History and a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2016).
- ㉝ 〈在首都人民歡迎越南勞動黨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大會上 周恩來總理的講話〉，《人民日報》，1971年11月24日，第2版。
- ㉞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 ㉟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 ㊱ Andreas Schedler, 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Boulder, CO: L. Rienner Publishers, 2006); Jason Brownlee,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Valerie Bunce,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eds.,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Vedi R. Hadiz, *Localising Power in Post-authoritarian Indonesia: A Southeast Asia Perspectiv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